

# 学术的力量

王友琴

余英时先生获得了克鲁奇奖。这是余先生的光荣，也是人文学界的光荣。应该有一场快乐而又含深思的庆贺。

这个庆贺对我来说，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即我可以用这个机会，不仅感谢余先生在两年多以前为我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作序，而且说出我从他写的这篇序言里学到了什么。事实上，是一名读者先给我打电话来建议这么做，要不然，我可能还会因为拘谨和被动的习惯而不知道该做什么。这名未见过面的读者在我的书上读到了余先生的序言而且非常喜欢。我也想自己应该做这件两年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

那是2004年春天，编辑金钟先生说将请余英时先生为我的新书作序。我心里感到不安，觉得这好像有点硬拉一位前辈著名学者来给自己做广告的味道，是不是太落俗套。再说，这本书长达52万字，读起来也太累人。

确如已经有人在媒体上说的，余先生不用电脑写作。那篇书序的稿子是手写的。余先生把手稿传真给香港的出版社之后，又复印一份邮寄给我。香港把手稿输入电脑后电邮给我，我就对照已经收到的复印稿和电子稿作了校对，然后再电邮到香港付印。-- 余先生的手稿书写得整齐清楚，他把排印运作流程也组织得秩序井然。这一点当时就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想，细节也体现着一位认真勤奋多产的学者的行事作风。我自己做事有时丢三落四，实在应该见贤思齐。

读了序言，我立刻意识到这对我的书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获益和荣幸，因为这不是一篇一般的介绍性的或者称赞性的序言（我并不是说那样的序言就不好），从这篇序言里，我读到了关于文革历史研究的深刻的见解，新颖的看法，渊博的学识，以及对未来研究的指导。这本书发行以后，也有多位读者向我表达同样的感想。也就是说，这篇序言本身可以是一份教材，让人能从中学到很多。

在序言里，余先生首先讨论了这本书的研究方法。他指出，这本书用访谈和实地调查的方法，写出了已被埋没的659个受难者的故事，有史料价值。他认为这本书属于西方“口述历史”的方法，但更合乎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他指出，孔子所说的了解历史所需的“文献”，便分指“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源。

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首先，我虽然也下功夫学过古汉语并教过古汉语，但是却没有特别注意过“文献”在古代是两个词而非一个词，只是在现代汉语中“文献”才被用作一个词来统称文字记录。应该自惭学问不够。另外，我在做文革研究的时候，把访谈和调查的重要性置于纸面材料的收集之上，并且在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时明确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能很好地概括这一方法。有了余英时先生的序言之后，在我的下一本书中，关于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的一章中，我便明确说

明，我的研究方法是“文与献的结合”。这个说法的出处是余先生的这篇序言。

我在做文革历史研究的时候，做了上千次采访调查。659名受难者的故事，关于“学生打老师”的全面性的叙述和分析，都是建立在这样的调查基础上写成的。用这样的方法工作，费时间费力气，还遇到相当多的麻烦，而且种种苦处也无处诉说。所以，听到余先生对我的书在方法上的肯定，我心里当然高兴。但是，我想这一方法上的讨论的意义，实在不仅在于肯定一本书，而是对整个文革研究以至现代中国历史研究都有指导意义。

研究方法，对科学研究至关重要。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方法有重大关系。在人文学术研究方面，方法也是使学术成为学术的重要条件之一。胡适先生当年曾大力强调改进在中国作人文研究的方法，这也是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余先生在这里指出的是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方法对文革历史研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文革当局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手段控制媒体，大量的事实从来就没有被记录下来过，研究者就必须从头做起。同时，因为有关的当事人还活着，所以可能这样做。在文革和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方面，过去由于权力当局的严格限制，不被允许这样做；现在已经有一些这样的空间，如果不加使用，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学者自己的问题了。

如果不作“献”方面的工作，“文”方面的记载本来就很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发挥出洋洋万言甚至几十万言的文章，却难以获得真的学术进展。在把余先生指出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文革和1950年代中国历史方面，我们还需要做更多探索。我去年阅读张戎新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写书评时也特别赞赏她采访了数百名和毛泽东打过交道或见过面的人的做法。我给《饿鬼》中译本写书评时，也特别赞扬了作者的一项工作：1958年的一张“新闻照片”上，麦子长得繁茂硕壮麦穗累累，四个孩子站在密密层层麦子植株顶上拉手欢笑。《饿鬼》作者访问了已经退休的新华社摄影记者，了解到孩子们的脚下放了长凳。我特别注意到了同行们在这方面的成就，当然也是因为自己愿意和他们在这方面能互相勉励共同努力。

另外，当余先生在说明这样一种“文与献结合”的方法时，他引用了孔子，还举出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曰”中提到其为写人物列传所作的调查访谈。此外，他还指出民国初年的一部县志，在调查采访获取事实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引用历史上的例子来做系统的说明，也是学术研究的特点之一。写诗这样做会被嘲笑为“掉书袋”即炫耀学问，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是必要的。这是一个让人对事情有更加深透的了解的有效方法。当然，要能这样做，必须得“学富五车”、十分渊博才行。只读过很少书的人无法这样做。此外，还得对读过的书融会贯通，才能从千年历史中梳理出这样的有用的经验和方法来。西谚说：你不必发明车轮。这是对的。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看不到那个车轮在哪儿。通过这样的从孔子到司马迁到民初县志直到出版于2004年《文革受难者》的研究方式的串讲，余先生把这只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中可用的车轮递到了我们的面前。

在讨论研究方法之后，余先生讲述了他自己的一段和文革受难者有关的故事：1978年他率领“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听到老家亲戚讲述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惨状。同行中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哈佛大学）听了余先生的转述有点怀疑。过两天张先生探望他自己的小学校长，回来说校长的两腿都被学生打断了，已经不能行走。余先生在序言中写道：“我在二十六年前偶然听来的事迹竟和本书所呈现的基本面貌若合符节，则本书字字都是实录，更无可疑。”我当然感谢余先生为我的书提供见证，但是余先生对26年前他生活中偶然听到的事情长期抱有的思索和求证的态度更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在我看来，这也是真正的学者的精神，学术中人的精神。我想，追求和探索真理是学术的本质，是学者的责任，这真理至少包括事实、因果以及价值判断三个层面。学术研究是有点象牙塔中的味道，研究对象以至所用的语言都可能和普通人有相当距离。然而人文学者们对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耳闻目睹的有关人道的大事，如中国文革中发生的教师大批被打被杀害，尽管可能不是自己的专业，也当抱有认真的态度，思索并探求真相和解释。这样，学者的人格才能统一，道德才能整合，专业研究中的判断原则才能明确。在这方面，余先生也是典范。

还应该提到，后来我有机会和张光直先生的女儿交谈。我传给她余先生的书序，询问他父亲的小学校长的名字。张先生已经去世。她立即去问她的母亲李卉老师。李老师立刻认真反复回忆。多次书信往返，虽然最后没有得到结果，但是我仍感到欣慰，因为这样的追求真理的认真负责的学术遗风尚在。

余先生自己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是他的历史学识使他对文革性质和起源有深刻准确的理解。在序言中，他引证明史，朱元璋曾经编写其语录名为《大诰》，称为“臣民之至宝”，还召集19万讲读《大诰》的师生到南京朝见。这和文革中毛泽东号召上千万红卫兵到北京集会，高举毛泽东的“红宝书”高呼“万岁”，相象得令人惊讶。此外，余先生还把苏联共产体制作作为同类对照，写出苏联的文化政策，包括对教师的迫害（教师是我的书中写得最多的一个受难者群体），和中国文革的高度相似。关于苏联的迫害历史，余先生在序言中引用了四本有关的历史著作。（这也让我知道他读书勤而多，以及他写这篇序言时绝不敷衍。）这不仅是一个中国俄国两国的比较性的描述，而更是一个对相似惨剧的共同原因的揭示。在这里，余先生又指出了文革研究（以及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多年以前，李慎之先生提出，文革发生是中国封建政治传统的结果。李慎之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他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的文章有很多勇敢而深刻的见解。但是我以为，他的这个关于因果的论断缺乏论证。例如，我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这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中报告的调查结果，无法用中国的传统来解释。中国有数千年的学校体制，孔子本人是个教师。文革中全中国所有学校都发生殴打折磨侮辱校长教师的事情，导致了大量死亡和伤残。这种对教师的残酷攻击是文革的主要场景之一。同时，毛泽东在文革中也发动了大规模的批判孔子的运动，集中否定孔子的“仁”的思想。很久以来我花更多时间调查记录文革事实，这是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但是原因分析当然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题

目。

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几年里，中国有过“文化热”，也有人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解释文革，但是实际上，这在很大成分上是因为环境不允许谈及其他原因。当对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讨论都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只好谈论比较含糊而又无主的“文化”。这本来是不得已的做法，是一种“权宜之计”，可是如果二十多年后弄假成真，仍然以为根源只是传统文化，就更令人遗憾了。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晚上，北京大学学生宿舍熄灯了，我却不能睡着，因为刚读了索尔仁尼琴的一本书，书中写了在苏联政工干部怎么对待普通人的一个细节。我在中国看到过一模一样的细节。这件事情让我震动以致失眠，不仅因为这个打击普通人的尊严的细节和我经历的毫无差别，还因为我自己在在此之前对此熟视无睹毫无感觉。

我讲出上述故事的意思是，在我，还是从我的实际观察和经验来认识到文革和苏联的关联的。但是余英时先生那时候没有在中国生活。他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他当然不是乱猜的。无疑，这应当归结为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和判断力，那种力量也就是学术的力量。

在《文革受难者》书出版以后，我写过题为《斯大林的“饥荒群体灭绝罪”：70年后》的文章，指出中国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也发生了这样可怕的饥荒，而且也被历史记录长期隐瞒。后来，我撰文介绍了在俄国为斯大林时代的受难者出版的光盘，上面有1, 345, 796个受难者的名字。我介绍这个光盘的内容并且讨论斯大林迫害和文革迫害的相关性。（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开放》杂志上。）余先生的序言让我更加明确与苏联历史对比是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方面。

《文革受难者》出版时，书前三篇序言。余英时先生写了一篇，麦克法夸尔教授写了一篇，苏晓康先生也写了一篇。我对他们的序言，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怀有深深的感激。三篇序言都道出了很多我不能说出的真理，让我学到了很多。但是我还是愿意在这里讲出以下故事：

书印出后，我托人带到北京，首先送给书中写到的一名受难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卞仲耘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1966年8月5日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在北京，她是红卫兵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在她被打死之后，发生了全国大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和普通居民被打死的前所未有的惨剧。然而，在文革时这样的死亡不被报道，文革结束后媒体仅仅报道高级干部和社会名流而不提起他们的受害。在报告卞仲耘的故事方面，体现了调查寻访的研究方法有多重要。

王晶尧先生看了书后，在电话上告诉我：三篇序言都好。余英时的最好。

第一句不出我的意料，第二句却有一点儿让我惊讶。因为论个人的经历和政治文化背景，三人中余英时先生和他相差最远。但是他能欣赏余先生所写的。为什么呢？

我的解释是，余先生序言中的某种力量，轻易超越了其他方面的裂沟。这种力量是什么？简明地说，也许可以称为学术的力量。

宣传可以煽动人，文艺可以感动人。学术呢？不能煽动也不能感动。但是，学术诉诸人的理性以追求真理。学术直接影响人的理念世界。特别是随着人们的平均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资讯传播的技术越来越发达，学术对人们的影响也会增大。学术有学术的力量。学术告诉我们世界和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和为什么是这样的。学术带给我们清明的理性。这种清明感也让我们更深地感受到人的尊贵和生命的意义。

我在余先生的序言中感受到了这种学术的力量。我愿通过这篇小文和读者分享这种感受，也以此庆贺余先生获奖。

\* 这里说的“学术”，指的是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相对于文学艺术以及新闻媒体等领域而言。